

# 目 录

01 生命的磨.....	1
第一节 天铸大错.....	1
第二节 是非之地.....	21
第三节 不堪回首.....	37
第四节 无怨无悔.....	47
02 苦乐童年.....	53
第一节 天灾人祸.....	53
第二节 刻骨铭心.....	65
第三节 泪洒校园.....	69
03 对命运说不.....	75
第一节 陌生世界.....	75
第二节 崭露头角.....	83
04 金子总会发光.....	89
第一节 从零开始.....	89
第二节 事与愿违.....	105
第三节 逼上梁山.....	109
第四节 祸不单行.....	118

## 01 生命的磨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李进巅被放到了中国最难从事的工作岗位上，偏偏他又是做什么都要拔得头筹的性格。于是，他误入了某种怪圈：越是能干，越是出类拔萃，他在这怪圈里就会陷得越深，最终酿成了他必然充当着一个悲剧的角色。

文化大革命快速催成着李进巅的政治仕途，28岁升任中国地级市的宣传部部长，统领着全地区的宣传文化工作；文化大革命又无情地埋葬着李进巅的政治生命，两年半，刚过而立之年，从高位上跌落下来。上也突然，下也突然；不知怎么上去的，也不知怎么下来的，时也，运也，命也……

### 第一节 天铸大错

1

1977年的春节刚过，李进巅走进沈阳友谊宾馆，尽管已经做了两年多的丹东市委宣传部部长（时称宣传组组长），多次进省城开会，还是第一次住进这座辽宁省的“国宾馆”。更让李进巅欣喜的是，分配他住的那栋别墅，曾经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住过的地方。李进巅是来参加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全省宣传干部会的。会议的主题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白天学习揭批“四人帮”文件，晚上看被“四人帮”封禁了十余年的国内外优秀影片。几天的会议，从形式到内容，让李进巅从内心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解放，也让李进巅憋足了劲，要尽快把丹东的宣传干部发动起来，为深入揭批“四人帮”造足舆论。

回到丹东，李进巅抓紧筹备全市宣传干部会。这时，省委宣传部又来通知：《毛选》五卷开始发行，省里在抚顺组织培训。李进巅让部里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副部长去。副部长传回话来，说手头的工作太急，抽不开身，不能去。宣传部正副部长加在一起只有五位，其中两位被市委派出蹲点，一位坐镇报社，兼任总编辑。发行《毛选》五卷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李进巅只好亲自出马，带着宣传科长赶到抚顺。

这是一个特殊而敏感的时期，中央对解决辽宁问题已经做出了决定，新省委对丹东问题的处理也解决在即。到抚顺后，同去的老科长平日里和李进巅很默契，很敬佩李进巅这个年轻人的正直、敬业。他对李进巅说：“你不能这么干了，人家背后在串联人搞你，你不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其实，李进巅也心知肚明。他知道在背后搞他的人是谁，可是又不便在部下面前说什么，只是一笑了之。脚正不怕鞋歪，李进巅在心里琢磨，我又没做什么坏事，你能把我搞到哪去！

按照省委的要求，丹东印刷厂是全省印刷《毛选》五卷的重要印点，纸型从北京运抵丹东，先在丹东火车站举行欢迎仪式，印刷前在丹东印刷厂门前要搞一个开机仪式，由市委书记讲话。考虑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书记的讲话稿李进巅没有让别人写，自己亲自动手。时值三月，天气还有些冷，举行开机仪式那天又不巧刮起大风。时任市委书记有气管炎病，讲话时被风一吹不停地咳嗽。

李进巅很自责，对站在身边的那位老科长说：“没想到天气问题，稿子写短些就好了，让领导遭这份罪。”

老科长看着焦急的李进巅，欲言又止。他很同情李进巅，也很敬佩李进巅，自己都坐在火山口上，还在替别人想。从回到丹东，他就有了山雨欲来的感觉，部里的一些人几乎公开在做揭批李进巅的准备，唯独李进巅像是局外人，一天到晚忙工作。李进巅做什么事情又总想做得完美无缺，自然少不了亲自上阵，这更让人心里不安和不平。几位老科长背地里议论，想要劝阻李进巅，可是又不知怎么说，只好任由他去忙活。

揭批“四人帮”运动越来越深入，中共丹东市委被改组，原市委书记成为丹东揭批的重点，随即推延至平日受市委器重的人。虽然李进巅整日忙于宣传部的日常工作，但内心隐隐地觉得，这把火很快就会烧到自己身上。以往的满不在乎早已不复存在，部内一些人的暗地串联，一天一天加重着他心里的负担。

改组后的新市委决定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新任市委书记霍遇吾要在这个大会上发言，写讲话稿任务交给了宣传部。这对于正心神

不安的李进巅来说无疑是一次天赐良机。或许是感觉自己的能力应该让新任领导认可，或许是有一种惶惶不安的心情使之然，李进巅自己动笔给新书记到丹东后参加的第一个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写讲话稿。

那天，李进巅到霍遇吾书记办公室送讲话稿。霍遇吾看过后比较满意，亲切地对李进巅说：“年轻人好好干，不怕犯错误，犯错误改了就好。年轻人允许栽跟头，我那时候栽的跟头比你还多呢！”

刚刚粉碎“四人帮”，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还没有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摆脱旧有的束缚，而又在那个特殊且十分敏感时期，新任市委书记对自己有这样的交代，李进巅心存感动。遗憾的是，事不遂愿。随着全市揭批查全面深入，李进巅被确定为重点人，1977年4月25日，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市委宣布，李进巅停职检查，不再履行宣传部部长、党的核心组组长职责。

刚过而立之年，不啻晴天霹雳。李进巅虽有思想准备，但，亲耳听到宣布的那一瞬间，满腔的血都涌到了头上。脸涨得通红，浑身燥热，迷茫无助的目光，不知放到哪里，仿佛所有的人都在看他、议论他。

从1974年11月调任宣传部，到1977年4月25日被停职，两年零五个月没早没晚地拼命干，落得一个被公开宣布停职检查的结局，而且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李进巅做梦也没有想到。然而更没有想到事情接踵而至。

3天后，4月28日上午，在市委宣传部长办公室，宣传部党的核心组召开扩大会议，专题揭发李进巅的问题。李进巅伏案记录。第一个带头揭批的是那位不去抚顺开会的领导，这在李进巅的意料之中。然而他的揭批内容让李进巅不寒而栗：把他和“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毛远新、宗明兰联系在一起，说他认帮不认党；压制人民群众悼念毛主席；反对华国锋当国家主席……已经完全把他置身在敌我矛盾的位置上，而且每一个问题都可以置他于死地。平日里一贯老成持重的李进巅，有些坐不住了，是惊恐，是愕然，更多的是因不理解而产生的委屈，握着钢笔的手，在微微地抖。

这位领导的揭批，声色俱厉，也一锤定音。接下来的一个又一个揭发、质问，犹如暴风骤雨，劈头盖脸砸下来。面对眼前突变的一切，李进巅越发不可思议：人们怎么会这么快变脸？几天前还谦恭地请示工作，记录自己的讲话，今天全变了。无限上纲不说，还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甚至把玩笑话也作为罪证打过来。李进巅非常吃惊，揭批的人几乎把他上任以来的每一天都翻了个个，过滤一遍。许多事情自己都不记得了，有的人却把时间、地点记得那么清晰具体。李进巅虽有抵触，心里不服，但，对一些事情的累积，对累积情况的系统化的剖析，让他感到了压力，甚至是恐慌。牛皮纸做封面、简易装订、印有丹东市革命委员会会议记录本的小册子，已经记了厚厚的一沓。

会议气氛非常严肃，除了揭批者在严厉地发言，肃静得没有一丝杂音。呛人的老旱烟，在房间的四周飘散着，满屋子蓝瓦瓦的烟气，遮掩着一张张没有笑容的脸。

揭批会议还在继续，但李进巅的注意力已不在发言者的身上，他不停地追忆着历史，一切都似乎清晰可见：毛远新，毛主席的联络员，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只是在沈阳辽宁大厦大礼堂听过几次他的讲话。宗明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她在台上讲话，自己在台下记录。惟一的一次接触，是她访问朝鲜回来路过丹东，市委安排自己去接她。带着宣传部的同志，只礼节性地看望了她。宗明兰给了几块从朝鲜带回来的黑饼干、黑糖块儿和一盒烟，自己全带回部里分给了大家。如此而已，自己怎么成了认帮不认党呢？

关于压制人民群众悼念毛主席，这怎么可能呢。李进巅最不能理解否定他对毛主席的感情。1976年9月9日下午3时整，带领全市宣传干部参加农业战低温和夺煤大战的李进巅，正在凤城县暖阳公社的稻田里拔草。突然，绑在电杆上的高音喇叭响起了哀乐。李进巅的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浑身激起了鸡皮疙瘩，脑袋里不由自主想到要出大事，似乎有种预感，毛主席不行了。哀乐声中播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书》。播音员刚念到“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李进巅就放声大哭。在往公社跑的路上，眼泪一直没有断过。想着周总理、朱德委员长逝世，毛主席又不在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职业的敏感，催促他必须立即请示市委现在干什么。李进巅是9月5日带领县区宣传部干部到凤城县暖阳公社的，先下了两天煤矿，在百余米伸手不见五指，只容一个人爬进爬出的洞子里挖煤，昨天才改为拔草。

跑到公社，李进巅把电话打到市委办公室，正好市委办公室也在找他，通知他参加第二天上午研究悼念毛主席的市委常委会。李进巅参加劳动的地方，距最近的火车站也有一百多公里的山路。他匆忙请公社帮忙联系了一辆空货车，选了一条近路，连夜赶往草河口火车站。李进巅乘上北京到丹东的28次特快列车，已经是下半夜了。

市委常委会做出了两项决定：一、丹东市只在文化宫设一个悼念堂，全市人民可以有组织地分期分批到这里举行悼念活动。这项工作由宣传部负责组织落实。二、根据省委的要求，防止出现天安门事件，不搞广场悼念活动。由宣传部、公安局、建委负责对红旗广场实施监控。

文化宫当天就布置完成，悼念活动开始有序进行。12日的晚间，建委向市委紧急报告：驻军230医院几名护士，要求到红旗广场向毛主席塑像献花圈。市委书记把李进巅和市委办公室主任找到办公室，简单听取了情况汇报后，让他们一块儿到230医院做工作。230医院政治部主任接待了他们，表示帮助市委做工作。然而工作没有做通，13日一大早，几名护士把花圈送到了毛主席塑像前。李进巅得到情况，感到这是自己的工作没到位，同时也很怕底下的同志工作简单、粗暴，把事态扩大，带着宣传部的同志立即赶到红旗广场。花圈虽不大，摆放在偌大的广场上，也非常显眼。几个穿着军装的女战士站在花圈旁。李进巅走上前亲切地对她们说：“市委已经在文化宫设立了毛主席悼念堂，你们可以到文化宫选一个满意的地方放花圈。那地方有人值班，给你们看守，比放在这里还更有意义一些。”几句话，小

护士们高兴地接受了。几天后，随着北京和全国许多大城市都向广场纪念碑、塑像献花圈，沈阳的红旗广场也不再禁止了，丹东随即放开。每一步都是按照省市的部署操作，怎么能变成自己压制人民群众悼念毛主席呢？

至于反对华国锋当主席更是无稽之谈。毛主席逝世后，人们都在议论谁接班？谁当主席？毛主席不在了，天塌了，中国怎么办？这是当时全国人民的普遍心态。各种议论都有，党政机关、军队、学校、工厂，以至街头巷尾，这是人们每天议论的中心。关系自身命运，即便是在最残酷的社会环境中，也封杀不住人们为自己前途担忧的舆论。宣传部，更是如此。有人猜测华国锋能当主席，也有人说张春桥能当总理，这些都是在办公室公开议论的。在一次谁当主席的议论中，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国家领导人的李进巅，被吸引了进去。他不赞成大家的说法，说：“我们党可能一段时间内不设主席，华国锋还是第一副主席，实行集体领导。”部长说了，许多人呼应，认为有道理。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由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决定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这一决定当时只限于党内传达，还未对社会公开。丹东汽车厂打电话请示宣传部，可不可以在大墙上贴庆祝大标语。宣传部一位科长接的电话，答复可以，之后把答复意见向李进巅汇报。李进巅一听就不高兴了：“不要随便答复问题，这样的大事要请示市委统一行动。”李进巅的口气又急又重。那是一位很能写文章的老科长，李进巅的严厉批评让他有些下不来台。

10月10日，华国锋当主席的消息在媒体上公开发表，随即人民群众的欢庆活动成为了媒体的主要内容。一天，宣传部办事严谨很有才气的青年干部宁岗，走进李进巅的办公室。他手拿着一沓《丹东日报》，对李进巅说：“《丹东日报》这样报道不妥。”随即翻开报纸，一一指给李进巅看：“华主席是我党最好的领袖、最好的掌舵人”，“江城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高采烈”，“华主席做我党的领袖是红小兵最大的幸福”。

宁岗说：“这样表述不准确，把话说得太绝对了。”

李进巅同意宁岗的意见，而且非常欣慰自己能有这样的属下。李进巅认为这不是件小事，亲自给报社的领导打电话，说：“注意一下，别把话说过了，容易产生否定毛主席的误解。”由宁岗写的内参也同时报送市委常委。

竟然连这种秘密的内参，都被作为公开的罪证具体详实地揭露出来，不能不令李进巅惧怕。按照中国人惯常的思维方式，李进巅已经看到了自己可怕的明天。在这非常时期非常重大的问题上，自己的言行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后果令他不敢去想。

随着全市揭批查的深入，对李进巅的揭批在更广的范围展开。先是一次次宣传部直属单位的揭发批判，继而又搞了多次全地区宣传干部的揭发批判。刚刚 31 岁的李进巅，此时此刻无人可以倾诉心中的苦闷，特别是社会上涌起那么多的“‘双突’干部李进巅”被打倒的舆论，让他痛苦万分。

## 2

上也突然，下也突然；不知怎么上去的，也不很明白怎么下去的。李进巅深深懊悔为什么要到宣传部工作，他十分留恋在丹东二运公司工作的那些日日夜夜。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李进巅在运输联社做党委秘书。他不仅文字功夫好，各方面的表现也都挺突出，已被确定为后备干部重点培养。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李进巅很可能沿着这条仕途之路走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快速催成着李进巅的未来。

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初，李进巅只是从报纸、广播上知道一点。更进一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丹东满街“破四旧”，许多字画、古籍被当街烧毁的时候。但是，真正体会到文化大革命的“威力”，却是李进巅被造反派勒令到无线电十二厂做钳工。

当时北京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活动越演越烈，进而演绎成 1967 年 1 月席卷全国的“夺权”运动。一天早晨，运输联社基层单位的造反派，把党委办公室、经理办公室，还有李进巅

一些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贴上了封条。进不去办公室不说，还叫嚷着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保皇派，必须下工厂改造。领导被逼表态，让李进巅他们离开机关到基层当工人。从干部到工人，工资一下子要减一大块，本能的反抗是必然的，机关工作人员和造反派顶了起来。一边要进驻夺权，一边不走，让领导收回成命。联社楼上、楼下、院子里挤满了人，乱糟糟的，到处都有喊叫声。

谁也不让谁，造反派就朝领导使劲。党委书记、经理被造反派严严实实地包围着，“打倒走资派”，“打倒保皇派”，“谁阻挡革命就砸烂谁的狗头”……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见领导在遭罪，双方的争执眼看就要动起手来，很有影响力的李进巅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走吧，别让领导为咱们操心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暴力争斗平息了。

李进巅被安置在无线电十二厂钳工班。工资由 64 元一下子降到 38.6 元，这让李进巅本来就十分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无处申辩，也只好随遇而安。在那个难辨是非的混乱时期，被下放当工人，让李进巅脱离了是非之地。憨厚的李进巅有一个优点——听话，长辈、领导、组织，只要上面安排的，就一定认真去做，而且一定要做好。还像在联社一样，早早地来，最后一个离开。他跟着师傅刘新田从锉刀、铁锯一点一点地学起。他暗下决心，要以最快的速度成为全厂最好的钳工。

随着社会动乱的加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催生了数不清的造反派组织。在李进巅下放到工厂去的一个多月里，丹东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名目繁多的总部、司令部，连街道老头老太太都带上了造反派袖标。人走了，保皇派的帽子还戴在李进巅这帮被撵走的机关干部头上。在那个年代，保皇派近乎于反革命的边缘，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是一种莫大的耻辱。1967 年 3 月运输联社已经成立了三个造反派组织。被撵走的机关干部急了，一位科长发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联社总部。联社总部成立后，办报纸没有人，一位副科长到工厂找到李进巅，调他做总部报纸的总编。

不与任何人为敌，多交朋友，李进巅深得父亲的言传身教。由于人际关系好，再加上又是在一个文化层次不高的群体里，李进巅的一手好文章令许多人敬佩。很快李进巅被推举为联社总部领导成员之一。1968年初，毛泽东主席号召大联合，运输联社造反派组织又共同推举李进巅做总指挥。1968年9月，联社成立革委会，作为几派都能接受的人选，李进巅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结合进革委会。1969年5月丹东市将二运公司（运输联社更名）、港务局、公路处、公汽公司四家合并一起，成立了交通系统，当了半年联社革委会副主任的李进巅再次以群众代表身份，被任命为丹东市交通系统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兼办事组组长。

几年的工夫，从基层这么快走上局一级领导岗位，是李进巅不承想过的。他始终谨小慎微，不事张扬。他看到过那么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他谨慎地提防着自己。到了新岗位不久，按照组织要求，李进巅作为组长，带领原来国营一运公司经理、公路处处长、公汽公司经理等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到一运公司的沙河镇车队蹲点，抓斗批改整改典型。一个月的朝夕相处，李进巅对老干部的认识，有了质的提升。在联社总部时，李进巅所在的这个造反派组织就是保老干部的。那时对老干部的认识，一半是出于传统文化滋养的尊敬，一半是长时间接触堆积起来的情谊。这次蹲点，李进巅和几个老干部吃住在一起，感情处得很深。

晚上，挤在一个屋里睡，房间潮湿阴暗，刚一躺下，臭虫就跑出来，上下左右，浑身都痒。

一位老干部找来一瓶汽油，说：“来，进巅，擦到身上就好了。”说完，自己往身上擦。

李进巅也爬起来，跟着他擦。其他的老干部也都跟着起来，一屋子的人，摸着黑，光着身子，边说边笑地往身上擦汽油。躺回床上，臭虫果然不再光顾。李进巅很佩服他们。工作、生活哪都有经验不说，一点没有官老爷架子。那时李进巅才20多岁，时间长了，几个老干部和他交成了朋友，友谊延续到他们的后代。

当年9月，进行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整党，同时开始发展新党员。工作成绩突出，人际关系又好的李进巅成了交通系统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在当期发展的新党员中，军代表、老干部、党员群众没有一个投反对票的，惟有李进巅一人。

这年的12月，毛泽东主席对从工人群众中上来的干部发布最高指示：“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很快中央就推出中共中央委员、陕西省咸阳市革委会副主任吴桂贤回西北国棉一厂纺纱车间劳动的典型。听话的李进巅马上申请到二运公司搬运二站，干起了最累、最苦、最危险的装卸活。从工人中上来的，又回到工人中，对李进巅来说没有隔阂。老工人们都很喜欢他，他也成了交通系统在全系统推广学习的典型。李进巅被交通系统主要领导看中。

### 3

1969年3月，尚未解体的苏联军队，多次对我国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沿岸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毛泽东主席即时发布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在备战备荒口号的统领下，挖山洞席卷全国。丹东各大工业系统都成立了战备指挥部。5月初，李进巅奉命中断了在搬运站做搬运工的生涯，当上了交通系统战备施工总指挥，带领交通系统的500多名职工，开上了位于丹东市城市西出口的北干石垒山。

还没有见过这样施工的。怎么打山洞，上级不管；打个什么样的山洞，只是笼而统之地告诉，打通就行。困难难以想象，没有设计图纸，没有地质报告，用的工具是镐头、铁锹、手推车。惟一的机械化，是用柴油发电机带动的凿岩机，而且连个明白的技术人员都没有。打山洞的专业人才本来就少，全国都在“深挖洞”，现培养又来不及，无奈，丹东军分区的司令、政委，带着每个系统负责打山洞的领导到大连学习。所谓学习，就是参观大连的山洞。李进巅到大连才第一次看到了山洞。

应验了那句老话，无知者胆大。初生牛犊不怕虎，人家能干，自己就一定能干。李进巅从小就有股子不服输的劲，但，他也不蛮干。从公路处调来一个搞公路设计的工程师和做地面测量的技术员，之后，又请来了一个会打眼儿放炮的工人师傅给大家当老师，东拼西凑组成了指挥部。李进巅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宣传鼓动。他把工作目标编成了口号，又制成了标语牌：“为革命打山洞打通山洞迎国庆”。一共十三个字，每个字做成长宽各一米的大木牌。一字排开，固定在面朝公路的石垒山顶上。无论坐车还是走路，大老远的就可以看见一溜白底红字的大标语，鲜明又显赫。

边学边干，边干边学，那时是普遍的作为。革命的需要，要远远胜过人的生命。“人定胜天”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不尊重科学，不尊重规律，仅“深挖洞”一项工程，全国死伤人员难计其数。当时，能给予牺牲者安慰的是，当地政府即可授予“烈士”称号。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的年代，“烈士”是全国人民公认的革命者最高荣誉。至于打山洞的物质待遇就是给每位战备施工者，每天补助3角钱。吃的伙食则是定量的玉米面饼子，加一碗白菜或萝卜丝汤。

8月的一天，李进巅正在洞里掘进面检查工程进度，只听头上呼的一声，一块三四百公斤重的巨石，紧贴着他的脑后掉了下来。巨石落地砸起灰浪，把李进巅推了出去。作业面被塌方下来的巨石和碎石塞满。头顶上，巨石掉下来的地方，一个偌大的窟窿。万幸，没有人员伤亡。可是头上这个窟窿怎么办？不填塞死，谁也不敢也不能在下面干活。可上去施工，在当时那种境况下无疑拿生命做赌。李进巅带领二运公司车队几名转业军人，二话没说就冲了上去。支木柱，搭架子，全然不顾头上不断往下掉东西和随时可能继续扩大塌方的危险。险情在最短的时间内排除了。

生死只在瞬间，李进巅的现场表现感动着工人，工人们舍生忘死的拼命精神也深深地感动着李进巅。工人们三班轮换，施工昼夜不停，李进巅没日没夜，三班都在山上。困了，就在机器房里倒一会儿；饿了，把裤带紧一紧，喝碗凉水顶一阵。他生怕出事故，怕伤人和死人。

很万幸，是因为他不停地巡回检查，还是苍天眷顾，在李进巅任期内无一人伤亡。而继任者接手不久，连续发生两起死人事故。

按要求，交通系统分担的山洞要从三个方面分三路同时往山的深处掘进，工程进展得很顺利，离胜利会师的日子越来越近。9月30日是计划贯通会合的一天。为了迎接这一天，好几个准备十一结婚的青年，谁也不请假下山。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夜深人静，500多人没有一个回家，都想亲身感受贯通的喜悦。大家把灯全部打开，还嫌不亮，又燃起一堆堆篝火，整个山上灯火通明。总指挥李进巅有意将三个掘进面的最后一炮安排在半夜12点，用贯通的炮声，迎接10月1日国庆节的到来。12点一到，三面同时点炮。炮响过后，大家都呆了：没打通！

有个青年冲上来就抓住负责设计的工程师，揪着衣领子质问：“你怎么弄的！为什么不通！”

工程师脸都白了，说：“我不敢保证测量是准确的。过去我是在地面测量，眼睛能看得见。这是在山里头，我看不见。”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李进巅脸上。

李进巅心里很清楚，绝不能言败，更不能放弃！此时，稳定军心是最重要的。他召开指挥部会议，要求大家不要慌，提出：“一、可能测量有误差，还没打到位，但误差也不会很大；二、大家都回自己的洞里去，再打一排炮眼，早晨6点放炮。如果通了，我们报捷，如果不通，我们放假回家，节后再干！”

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冷静、沉着，好有大将风度。过后，李进巅说：“那时如果慌了，拖泥带水，不果断决策，整个就乱了。弄不好，那个工程师就可能要被工人们打死。”

6点的炮声，带来了满山的欢呼。炮一响，三个洞口同时蹿出浓浓的烟浪。白色的，裹着炸药余香的烟浪，在大家的腰际间缓缓地漂浮着。谁也顾不得烟呛，欢呼着往洞里跑。三个洞的工友会合在一起，相互拥抱、跳跃。李进巅安排9名工人，拿上九个炸药包到山顶上燃放，代替礼炮庆祝自己的胜利。

整整五个月，李进巅吃住在山上。家就在山底下，连一次家门没进。新婚燕尔的妻子，一听见炮声，心就一揪，跑到门外，怀揣不安和思念，向山上眺望……

突出的业绩，李进巅在交通系统的名气越来越大，成为难得的干将，哪里有急难险重任务，就让他挂帅出征，江上抢险，荒山修路，下乡支农，样样都有他。1970年10月下旬，市革委会决定重新组建运输联社，新名称叫丹东运输服务公司，县团级单位。李进巅被调任运输服务公司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这是李进巅最有成就感的时期。亲身感受过手推车工人之苦的李进巅，上任伊始，就大胆提出，改革生产工具，扔掉手推车，自己制造机动货运车。这一动议，得到了领导班子的认同，更得到了手推车工人和联社老干部们的支持。“坚决撇了车把子”的呼声非常高，想想再也不用出大力拉车，工人群众喜出望外，积极参与。试制初期，为了解决原材料不足，有的工人把自家盖鸡窝的铁板都拿来了。

再没有这么简易的机动运输车了。先焊好一个铁架子，装上三个轮子，再在前上方加上柴油发动机，通过发动机皮带的传动，带动后面的两个主动轮子转动，有点像拖拉机，实际上就是采用拖拉机的原理。架子上面再安上个可坐两个人的棚、一个装货的翻斗。转向就像手推车把前端的横梁，靠两只脚蹬，哪只脚往前蹬，车就向相反的方向行进。原理简单，工艺落后，外形粗糙，噪音非常大，跑在街上，老远就能听见它“突突突”的叫声。笨重、落后，开车的又都是原来拉车的老工人，丹东市民戏称它“老头乐”。工人们却高兴万分。一共制造了300多辆车，600多手推车工人从此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让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这次“手推车革命”，无疑给了他们第二次解放。不管社会上说什么，一辆“老头乐”一年净赚一万多元。那时30元能养三口之家，一万元是个多大的数字啊！

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老头乐”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考量，都是不合规矩的，都是不可能允许生产和运营的。但是，在生产几乎停滞，

国民经济尚十分落后的那个特殊时期，有这样一个还在从事生产工具革命的角落，有这样一个满腔热情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的群体，不能不说李进巅和他工友们的难能可贵。

之后，运输服务公司用这“第一桶金”，购置了一批小卡车和大货车，陆续淘汰了“老头乐”。这些被人们瞧不起甚至讥笑挖苦过的“老头乐”，使丹东运输服务公司真正成为了合乎规格的运输公司。至今说起“老头乐”，李进巅还是充满激情，为它骄傲，为它恋恋不舍。许多往事是李进巅挥之不去的，那里面储藏着忘却不掉的苦辣酸甜。

正在“老头乐”研制的关键时刻，公司家属楼竣工。研制组的一名骨干，自知不够分房条件，自己撬开一户新房搬了进去。文化大革命时期，职工住房都由单位自建，无偿分配。职工强抢新房现象遍及全国各地。这位骨干是公司车队的一位高级钳工，谁做工作也不听。李进巅既负责研制工作，又分管公司的后勤，负责建房和分房。一户被抢，全公司的人都在看，也有不少人在跃跃欲试。

一天晚上下了班，李进巅来到那个骨干家做说服工作。他当警察的儿子回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发了一通火。

李进巅耐心对他说：“这次分房不仅有具体标准，还要群众讨论通过……”

话没说完，做警察的儿子，朝李进巅就是两拳。周围的人还没缓过劲儿来，他又照李进巅使劲连踢两脚。大家忙把他拉了出去。

李进巅没有说什么，领着同去的人走了。冷静下来，那个骨干的一家人坐不住了。抢房子，打领导，无理加犯法。内心的胆怯，一家人主动搬了出来。那位骨干整天担惊受怕，怕李进巅打击报复，无心工作，而那时正是机动车研制的关键时刻。

李进巅找到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有负担，知道错改了就好。你要发挥骨干作用，快些把车造出来，让咱们的手推车工人早一天开上车。干得好，我给你记功，奖励你。”打人的事只字未提。

那位骨干放下了思想包袱，工作干得非常出色。他说：“不好好干，我对不起年轻干部这片热心。”

对待这样无理取闹的人，特别是极端老上访户，李进巅也有苦不堪言的时候。1971年1月6日，李进巅喜得贵子。乐不可支的李进巅，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整天合不拢嘴。

好像老天有意要让李进巅收敛他的快乐，妻子还在月子里，车队一名司机要求调动工作，去一家副食品商店。文化大革命，每人每月三两油、10斤米，一切凭票购买的年代，能到这样一个有吃有喝的单位开车，那真是最美的差事。可是，对运输服务公司来说，损失太大。当时培养一名司机非常不容易，光时间就要一年，各单位都很缺，所以领导班子研究坚决不放。

那个司机40多岁，长得五大三粗不说，还一脸凶相，每天晚上下班拎着饭兜子到李进巅家上访。李进巅的家，包括厨房仅有16平方米，他进屋，搬个凳子就坐在地中间。这样一个生人天天闯进正在坐月子的人家里，李进巅的妻子又羞又怕。李进巅下班晚，家里很窄小，地和炕之间只有一米的间距，那人来时又正是孩子要吃奶的时间。这可难为死了李进巅的妻子，喂，不行；不喂，也不行。孩子饿得“哇哇”大哭，妻子看着孩子，眼泪“扑哧，扑哧”往下掉。车队领导听说后做那个司机的工作，他不但不听，还要挟说，天天上访影响休息，第二天开车出了事故领导要负责任。就这么磨叽了一个月，李进巅始终不妥协。他坚信一个理念：只要认为是对的，就坚忍不拔地坚持下去。在这场马拉松式的博弈中，实际上是意志的较量。谁能坚持到底，谁就能够成功。

李进巅也不干耗着，他改变了打法。每天早晨，李进巅早早安排好工作，等那个司机一到，就把装卸工换下来，自己跟车装卸。一有空，李进巅就给他讲公司的困难，讲没开上车的那么多手推车工人的苦……虽然最后领导班子决定放走了他，认为这样的人强留着弊大于利，但那个司机对车队的司机说：“李进巅，我算服他了！”

如此棘手的难题，就这么一个又一个被化解，李进巅的威信在运输服务公司基层陡增。工人们都十分尊敬这个个子不高，眼睛不大，脸庞不白倒也不黑，却总是让人感到有点严肃的年轻人。有了什么难

题，大家都愿意找他；李进巅安排个什么事，大家也都认认真真去做。在权威普遍丧失，各自为政成为习惯的大环境中，还只有 24 岁的李进巅能赢得这份尊重，是很了不得的。其实，这是李进巅刻意所为的结果。

在李进巅走上领导岗位的第一天，他就告诫自己，从工人堆里走出来的自己，绝不能忘了这个根本，无论遇到多大的委屈，不能耍权威。这种有意识的约束，随着不断解决问题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了带有李进巅印记的处事哲学：外圆内方。原则、规矩不可破，处理过程要柔和；凡是和个人利益相关的问题，不能强制，不能激化，只能化解。

领导班子分工，李进巅还分管全公司的安全生产。这又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无政府主义，造成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被废止，其直接结果，生产混乱，安全事故频发。形式上看，工人群众从各种束缚中有了解脱，但实质上，最终受害的依旧是工人群众自己。运输服务公司下属单位汽车队，每年重特大事故都有五六起，不是压死别人，就是压死自己人，什么样的蹊跷事都能发生。

车队有一批三轮货车，前面驾驶室下是单轮，后边货斗下是双轮。一辆车去农村拉鸡蛋，装卸工贪小便宜，在棉坎肩里面缝上了两个大兜子，偷着装满了鸡蛋。他坐在驾驶室的右边，车下大坡向右转弯儿时，速度有点快，汽车向右倾斜，司机大喊一声：“不好！”装卸工急忙把头伸出窗外看。就在他看的瞬间，汽车缓慢地翻倒了。汽车没有大损伤，司机也好好的。可装卸工一看车要翻，慌忙护着怀里的两兜子鸡蛋，忘了把脑袋收回来。结果，两兜子鸡蛋没一个碎的，他的脑袋被车挤扁了。

许多事故惊人的相似。一名小个子老司机，就爱喝酒。一天货主给了他一瓶散酒，怕洒了，放在自己的座椅前。行驶中，前面遇到情况，一点刹车，突然想起那瓶酒，慌忙弯腰去扶。酒没洒，汽车重重